

香港傳真

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
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

No. 2007-11

2007年2月28日

四十年的盧溝橋

張承志¹

1

從未有過一次寫作如這一篇，從立意一直沉吟，居然躊躇了二三十年。

它總得難合時宜。20週年時就有了這個念頭，但那時毫無談論這個題目的條件。那祇是一種蠻橫的壓力，逼迫的氣氛在強人所難。那麼我拒絕，我想，談論它需要真正的暢所欲言。耐心等待時過境遷，我悄悄地作著準備。但就在幾乎動筆時，新的更惡劣的話語環境又在合圍。

人可以再次回到緘默，但心裡的自責卻在堆積。因為這不是

¹ 寫於2006年初秋，紅衛兵誕生40週年紀念之際。

一篇私人的學藝之作，這是一筆不能逃避的孽債，是一次贖罪。

20年過去以後，30年也過去了。如今已接近他含恨死去的40週年，還是沒有期望的氣氛。但是我的心裡一直印著這個題目，它宛如一個陰影或一個牙齒，齒咬著我的內裡，使我覺得心事未完。在漫長的時間裡，它似乎是我的一個莫名的陪伴，我的文字因他不敢狂妄。這是一筆作家的負債，不寫了它，我不能獲得安寧。

今天是40週年的一個紀念日，我決心把它寫掉。看來它永遠也難逃不合時宜的宿命，而我也沒有餘裕太久地等待。

過長的腹稿時間，造成了思想的複雜。時至今天，我要寫的已經和20週年時大大不同了；已經有了更多的問題加入，同時事情也變得簡單，其實要說的非常直白。

北京郊外的盧溝橋，座落在被截流之後的永定河上。河灘地破敗不堪，工業驅趕了鄉村，滿目一望荒蕪。文化大革命中被命令遷出的穆斯林墓地，就安置在橋附近、一個風水惡劣的坡崗上。在一邊，緊緊毗連著這片墓地的，都說就是北京市處決死犯的刑場——我想紀念的遇羅克，大概就是在這裡，被一顆槍彈擊碎了頭顱。

2

已經記不清是1966年的冬天，還是在次年的正月。祇記得那時街頭駛過的宣傳車上，塗著打倒反動的〈出身論〉的標語。接著在一份小報上讀到了那篇長長的文章，印象是他們是另一派的敵方，屬於壓迫老紅衛兵的思潮。

今天誰都知道：那是一個以家庭出身為藉口，對人實行分類、

歧視甚至壓迫的時代。但當事者喜歡拘泥有利自己的細節；以家庭出身把人劃分三六九等的種姓狂熱，祇不過橫行了兩三個月就土崩瓦解了。到了 1966 年 10 月，全國已是一派批判反動的血統論的怒潮。到了那個冬天，曾經驕橫一世的老紅衛兵正紛紛銀鐺入獄，中央文革對“老子英雄兒好漢”做了富於理論意味的結論：“他們主張的，是封建的地主階級的血統論。”尤其當時江青夫人的凜然怒斥一直使我記憶猶新，甚至至今覺得振聾發聵。小報上印著她激烈的言語：“他們自認血統高貴，精神貴族——什麼東西！”

他的死，其實不是在血統論橫行的八月，而是在血統論如過街老鼠處處被圍追堵截的時候，突兀地發生的。

我在很久之後也沒有弄明白：究竟為了什麼，專政的鐵拳會狠狠打在了一面認真研究著黨的政策和毛澤東思想、一面順應著全社會對血統主義批判的〈出身論〉作者的頭上。歷史腳步在當時的具體痕跡，悖乎人想當然的估計。其實人早就被深刻地分類對待了。這是一種異化的跡象。祇不過，不管是當時高人一等的一方，與感受歧視的另一方，都沒看見社會這更深的一層。

在舉意寫這篇文章以後，我多次企圖讀到遇羅克的判決書，但至今也沒有如願。後來聽說出版了一本悼念他的書，但我已經無所謂了；因為我更強烈地意識著的，不是枝節的解釋而是立場的追究——畢竟我的雙腳曾經站在那一邊；在那一邊，我們看殺或者加害，心情輕鬆，不假思索。

派別是階級的一翼，這是當時流行的一句話。但當時的我們，沒有意識到自己所屬的、是怎樣的依附權勢的一翼。我們全然沒有發現，唯獨自己投身的它，沿襲著一種漫長的歷史和階級的腐朽，它隱藏著人的對他者歧視的惡秉，它是一種卑劣的傳統，一

種醜惡的遺傳。

當然這都是今天說出的話。而昨天，躋身這一翼會有舒適的快感。哪怕在講究精神的 60 年代，附庸體制的快感是實惠的；即便少年的我們，也在本能中懵懂地懂得這些。

哪怕到了此時此刻，哪怕思想的認識已然足夠，我也不敢說：若是那時頭腦清晰，我就能一邁腳踏入泥潭。還有一個更大的主角叫做恐怖。衆多的、被視為反體制的思想和行為，事先已決定規避那種遇羅克遭逢的恐怖。當年，就算意識到了這一邊的不義，誰能說，他肯定會蹈火赴難，站到受辱的那一翼去！

抗議“歧視”的遺產，裡外都滿是苦澀。也許也正因此，它才顯得那麼寶貴。

這個潛入革命的母體、在 1966 年突然成了精的怪胎，好像生來就是為了對那偉大的時代實行玷污。我對它不能容忍。它那麼骯髒地玷污過，連同我們對革命的憧憬、連同我們少年的熱情。在日本出版的《紅衛兵的時代》一書中，我講述了自己的這種心情：“隨著自己的能力增長，我一天天一年年地愈來愈厭惡血統論。我覺得，它在我最純潔的少年時代侮辱過我，或者說，它使我在自己的人生中有過因恐懼而媚俗的經歷。我因此而極端地仇視它。”

那時的敵視是含混的。我並不懂，要迎對的敵人是對人的歧視。

一個印象淺淺地，但是鏤刻著。在我淡漶的記憶中，一絲震驚像永遠鳴響的警號。即使那時還不諳世事，即使當時身處與他對立的營壘，即使後來聽說他還觸碰過更大的禁忌，我仍不能想像：那篇文章的作者居然會被槍決。

前些年看多了善人們的懺悔表演。那些沉思冥想的作態不值一文。我想，真的懺悔並不用詞語表示。它遠比人想像的激烈得多。它是一種宣言和戰書，是自尋死者的風險，是踏上死者的立場。死者不需要道德文章，但他們渴盼有人繼續他們的奮鬥。

我不僅不認識遇羅克，甚至不熟悉他的故事。他於我祇是1966~1967年的那個印象，如一個陌生的符號。但我知道，沒有誰能如他，數十年如一日在我的靈魂暗處，一直凝視著我。

不消說他若活到今天，無疑是一名作家。那麼多不適當的人都成了作家了，他怎麼不能呢。但他倒在盧溝橋邊的溝壑裡，祇留下了〈出身論〉。不能把這篇在苛刻語境裡寫下的文字，視為他表達充分的遺作。他留下的遺產，是拒絕對人歧視的立場。

多年來，在無人知曉之間，每逢踏出關鍵的一步，每當面對思想的抉擇，我都感到與他發生了對話。因為對人尊重或歧視的命題，並未因為祭壇上有他做了犧牲就已然結束。也許正相反，在更大的範圍內，這個衝突愈演愈烈，它對知識分子的要求，在他慘死的幾十年後日漸尖銳。

敢於反抗歧視，決意與被歧視者站在一起——在歌舞陞平的此時，如招人嗤笑的一種怪談。但它又確是知識分子優劣的標尺，是戳破偽學、偽文學、和取媚體制的偽知識分子的利器。哪怕恰是那些人，多把遇羅克掛在嘴上。

我想，若是對死者的悼念，祇是替換成新形式的歧視他者，則盧溝橋的冤魂就祇能抱恨了。那至少是對逝者價值的輕慢。但是不會，死者的強大啟蒙不會允許，40年前他殉死的刺激，宛似大地上撒下的種籽，祇要遇上氣質類近的人，種籽就孕育胚胎於土壤，早晚破土而出，發芽抽枝。

在如此沉重的一篇文章裡涉及自己，首先會使自己感到不能容忍。但是，當我在 80 年代末，看著自己的雙腳走在貧瘠的黃土高原上的時候，我確實感到過一種踏實。因為那時我的心裡似乎掠過了一絲欣慰，我意識到：也許我可以面對那位陌生的死者了。和一個受到曲解、歧視、壓迫的群體在一起譽毀與共，盡我微薄之力，還他們以尊嚴——原來這就是我苦求不得的形式！這就是我的懺悔，它更是尖銳的挑戰。我忍不住莫名的興奮，再也沒有走得猶豫。因為我相信，這種位置和處境是能經受住遇羅克的審視的，它遠比那種欺世騙人的懺悔作文更具意義。

我不知道，我有時忍不住想對他說——當氣質類近的人真地走來，真地選擇了被歧視的一翼、真地加入了低賤者的陣營、甚至也賭上人生直面著盧溝橋的風景時——是否就完成了宿罪的清算，是否就做到了對他的告慰。

4

悼念也不是虛偽的讚美。有時候，思想的試煉，即便對死者也不會放過。這是一個有點苛刻、但饒有深味的話題。不止一次，每當念頭集結到他身上的時候我總禁不住想：若是他活到了今天，他會走到哪一邊去呢？

他在自己的早期思想之上猝然倒地。他完成了自我，沒有再面對以後的一系列歷史拷問。然而繼他而來的人必須正視這些，因為歷史不會原樣重複，他反對的特權與歧視，會不斷地變幻舊貌新顏。我們想念著以前的他，選擇的卻是紛雜眼前的路。

記不清多少次和舊日的朋友談到過他。我試探他們對這件事的心思，想知道他們是否也心懷負疚。因為他們中的一些人，也

許該對他感到更多的責任。但是人大多習慣了活得輕鬆，一如他們也並不覺得應該對巴勒斯坦的受難、對阿富汗或者伊拉克的亡國、對伊朗的遭受威脅憂心忡忡。他們不同意 60 年代的中國教訓之一，即對人的歧視乃是一項嚴重的罪惡；正如他們不同意——新帝國主義的世界控制戰略與陰暗的他人歧視思想互為表裡；他們反對——今天對新帝國主義的抗議，是正義知識分子的人道原則。

遇羅克會怎樣分析每天流過電視屏幕的、嚴峻而恐怖的現實呢？他會怎樣堅持自己抗議歧視的思想呢？我們無權這樣追問死者。但是，又確實存在著對民主本質的追究。強加給人類的不盡的艱辛和流血，要求著一種思想的進步。

我們已經看慣了一些所謂鬥士，從民主的火線突圍，卻鑽進了帝國主義的褲襠。儘管歷史已幾度周折，帝國主義已幾次撕去民主的面皮，但他們卻依然老經舊調，既沒有清醒地分析大局，更沒有反省自己的生存——由於他們繫前途命運於帝國主義之卵翼的存在方式，他們的啟蒙，被啟蒙的本質否定了。他們呼天搶地扮演的悲愴角色，已經變質為帝國主義正當性的註解。

遇羅克與他們之間，存在著不易察覺、但是區別巨大的不同。我以為這一強調是重要的：遇羅克民主思想的核心，是抗議對人的歧視。回味這種色彩和立場，它悲哀而堅硬，它屬於漆黑的下九流，無緣附庸上流的精英味。他寫過的那部作品，祇是被踐踏污泥的、卑賤一族的爭辯書。這種歸屬，本質上反叛著上述的“豢養”，甚至與強勢的世界不能共語。被歧視的卑賤地位，可能養育一種深刻的尊嚴，也可能導致更可悲的下賤。對他的思想所處立場的留意，使得我總想窺見他的來世。

做為他的承繼者，我們今天面對的，是變本加厲的各樣歧視。

對人的歧視並沒有隨著上個世紀的結束而收斂，反而從新世紀降臨伊始，就大肆地全球蔓延：對弱者、對少數、對他者的權利、對貧瘠的第三世界、對不同的文明。從民主渴望開始舉步維艱的啟蒙，又悲劇般迎對著侵犯和抹煞他者文明的神聖十字軍同盟，正如迎對著當年神聖的“階級路線”。

每年幾次，凡是去盧溝橋墓地的時候，我總是順著老人的指點，試圖尋找那個地點。隔著一簇簇穆斯林的土墓，隔著一條土路，據說就是槍斃犯人的刑場。他是倒在這裡麼？他是被打在頭部麼？忙著自家的掃墓，想著他的故事，我的周身掠過異樣的感覺。距離危險和殘酷居然這麼近，這不能不使人聯想怪異。

無論如何，他的故事所挾帶的血腥，使追隨的人心懷緊張。盧溝橋原貌未改，仿效他危險而困難。我們是在空隙寬闊的時代，重溫他的遺產、並決定要走他的路的。歧視似乎遠遠淡去了，也可能正烏雲般嘯聚，加緊其全球化的過程。比起他，一切都沒有多少改變，甚至失去了思潮的擁簇。不過這不是一個非要勞神的題目；道路自會引領著人前行，弱者和英雄，當他們在走向盧溝橋的時分，結果會相差得很少。

僅以這篇小文獻給遇羅克的冤魂，並紀念紅衛兵誕生的40週年。